

Xiandai Wanjizuoja
Yishulun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基金项目

现代皖籍作家 艺术论



谢昭新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基金项目

现代皖籍作家

谢昭新 著

艺术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安徽文艺出版社

现代皖籍作家艺术论

谢昭新 著

责任编辑:刘 哲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75

插 页:2

字 数:240,000

印 数:1000

版 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38-1/I·1618

定 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综论:安徽地域文化与现代皖籍作家

- 一 安徽地域文化概说 (1)
- 二 地域文化与现代皖籍作家的艺术创作 (9)
- 三 皖籍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36)

第二章 皖南作家艺术论

- 一 胡适《尝试集》对新诗的贡献 (65)
- 二 论胡适的戏剧观与戏剧创作 (84)
- 三 论汪静之《蕙的风》的艺术风格 (95)
- 四 论苏雪林散文的艺术风格 (113)
- 五 论苏雪林的小说创作 (126)
- 六 论吴组缃小说的皖南社会风情 (137)
- 七 论阿英历史剧的艺术风格 (159)

第三章 皖中作家艺术论

- 一 论陈独秀的文艺思想 (177)
- 二 论朱湘的文学观 (185)
- 三 论朱湘的诗的艺术风格 (194)
- 四 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 (211)
- 五 论张恨水《啼笑因缘》的人物描写艺术 (220)
- 六 论田间的诗歌创作 (231)

第四章 皖西北作家艺术论

- 一 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 (243)
- 二 论台静农乡土小说的艺术特色 (264)
- 三 论台静农的小说集《建塔者》 (278)
- 四 论韦素园散文的艺术特色 (285)
- 五 论韦丛芜的诗 (292)

后 记 (305)

(12)		一
(9)		二
(30)		三
		章二第
(28)		一
(48)		二
(92)		三
(111)		四
(831)		五
(131)		六
(173)		七
		章三第
(133)		一
(331)		二
(101)		三
(111)		四
(055)		五
(123)		六

第一章 综论:安徽地域文化 与现代皖籍作家

一 安徽地域文化概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犹如一只翘首报晓的金鸡,在鸡的腹部,有一块地处淮海大平原南部,东接沿海省份,南与赣浙毗邻,巍峨的大别山蜿蜒西境的省份,那就是安徽。安徽历史悠久,文化渊源流长。据说,中国第一个朝代夏王朝建国于今安徽境内。大禹曾在今怀远涂山“大会”各方部落首领。禹将天下分为九州,安徽省的淮南属扬州,淮东部属徐州,西部属豫州。夏王朝以控制众多的部落小国家——“方国”的形式统治全国,在今安徽境内,英(今金寨)、六(今六安)是其重要的方国。相传,商王朝的发祥地就在淮北地区。历史上的安徽境内有皖山、皖水,春秋时又有皖国,到了清朝初年(1667年)建省,以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定名安徽,又简称“皖”。安徽现设有10个地级市、10个县级市和58个县,总面积为13.9万平方公里。它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饶,境内有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水系。地形多种多样,平原、丘陵、山地相间分布,自北向南依次为淮北平原、江淮低山丘陵、长江沿岸平原和皖南山区。它有世界一流的风景区——黄山,以及九华山、齐云山、天柱山和琅琊山等风景名胜;有煤炭铜铁,各种矿产;有茶叶油菜、小麦水稻;有扬子鳄、白鳍豚等珍贵动物;有白芍、滁菊等名贵药材。它民族众多,各少数民族

和汉族人民一道,以他们共同的智慧才能,创造了与江淮大地相映衬的独特的文化。

1、江淮大地上的远古人类活动

安徽原始文化来源于和县猿人。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和县龙潭洞发现我国现存唯一完好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和上臼齿四颗,左下颌骨一个及一些动物化石。这些头盖骨、齿化石,后来被称为和县猿人,大约生活在距今28—24万年前,相当于周口店猿人洞3—4层的时代。和县猿人的发现,表明早在几十万年前,地处我国东南部的江淮地区已开始有人类生活了。继和县猿人之后,生活在安徽境内的原始人类,有巢县的巢县早期智人、泗洪县(1955年划入江苏省)的下草湾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的生活年代,大约距今22万年左右。下草湾人股骨化石是介于中国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化石。巢县智人和下草湾智人的智能超过和县猿人。据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安徽境内水阳江流域的宁国县河沥镇和宣城县以及巢县的岱山均有旧石器遗存,标志着安徽原始先民使用石器、石核、石片、砍砸器等原始简陋工具,开创了皖南、江淮的原始文化。

到了新石器时代,从安徽境内数百处新石器遗址看,最丰富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左右,肥西古埂下层文化遗址和定远侯家寨——古埂类型文化,那时的人们已具有结网捕鱼、张弓弹鸟等生活手段和技能;二是以潜山南面的薛家岗为中心的一支山地丘陵类型的原始文化,大约距今五六千年之间。薛家岗文化遗物大致分为玉器、陶器和玉石类装饰品三大类,其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和,适合农作物生长。三是以宿松黄鳊嘴为代表的文化遗址,其年代与薛家岗早期相近,分布地区主要在江北沿江一带,陶器以粗泥陶为主,亦有一些灰陶和黑皮陶,有各种纹饰。四是江淮地区的龙山文化,陶器以灰陶、黑陶为主,普

遍出现轮制,除有蓝纹、绳纹等外,还有少量的方格纹。石制生产工具有扁平单孔石铲、石铤、石镰、石刀等。以上几个地区的文化,尤其是薛家岗文化,从它烧陶技术的逐渐提高以及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到它的晚期,作为收割工具的大型多孔石刀和贮藏粮食用的大陶缸的出现,反映农业生产已占主导地位以及物质文明的提高,预示着安徽文化历史野蛮时代行将结束,文明社会即将到来。

2、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安徽不仅是中华大地上远古人类活动居住地之一,而且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安徽地域文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现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中国古代史前存在着三大民族集团,即河洛民族(华夏集团)、海岱民族(东夷集团)和江汉民族(苗蛮集团)。河洛文化区位于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陕西、河南龙山文化是其代表。始祖为烈山氏,后来的部落氏族领袖炎帝(即神农氏)和轩辕黄帝联盟,产生了族外婚的婚姻形式,繁衍出世代的炎黄子孙,会种谷物、蔬菜,懂得纺织,会烧制陶器,距今六至八千年。海岱文化区,位于黄河下游、黄淮之间的广大地区,居住着夷人各部,最早见于史书是伏羲氏为“九夷”部落联盟首领,始作八卦,教人渔猎。大汶口文化是其代表,后来其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被黄帝打败,并入华夏族。江汉文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是古苗蛮族各部居住地。《史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最早培育出水稻,距今已七千年,湖北屈家岭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是其代表,陶器以黑陶、灰陶为主,孕育了其后的楚文化。安徽的沿淮、淮北大部属海岱文化区,而江淮及沿江江南则多属江汉文化区。三大文化区在以后的交流发展中逐步融合,共同创造了史前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而作为安徽境内

横跨两个文化区的文化，也就在互相交流融合中，显示出它在创造中华史前文化中的光辉业绩。到了夏、商、周三代，奴隶制得到了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和文化日益繁荣，科学技术也得到了进步。而这三代文化的日益繁荣与安徽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夏王朝本来就建国于安徽境内，商发祥地在淮北，淮夷与周王朝又有着接连不断的关系。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也连带了安徽地域文化的繁荣。

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图腾崇拜是构成中华原始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图腾崇拜属于一种原始宗教，在上古时代广泛地存在着。每个氏族及部落以某个自然物作为本族的标志，称为图腾。而每个成员都得承认自己和图腾有特殊的关系，并对之顶礼膜拜。《左传·召公十七年》记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即是说，以黄帝为领袖的一族是以云为图腾，以炎帝为领袖的一族是以火为图腾，共工为领袖的一族是以水为图腾，太皞为领袖的一族是以龙为图腾，他们都以崇拜的自然对象为本族的标纪（“纪”）和族名（“名”）。图腾崇拜又常和氏族来源结合在一起，从思维水平说，它是人类开始向抽象思维迈出的第一步。

除了图腾崇拜，巫术思维和神话思维也是早期人类认识和思维的重要形式。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含山县凌家滩4号墓中的长方形刻纹玉片，有人说它反映了安徽先民的原始信仰活动；也有人说它可能是古河图和八卦，若是八卦，则反映了这种八卦思维是在巫术和占卜有了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显示了安徽先民思维方式的进步。作为上古神话这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反映了先民对外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在《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大禹治

水等。而在这些上古神话中,《夸父逐日》中的“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是在今大别山附近(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后羿射日》中的后羿,据《左传·襄公四年》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锄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路史》讲“穷石”在安丰,即今寿县、霍丘两县境内。大禹治水、禹娶涂山氏女的神话传说,地域源头在淮河流域,它寄托了安徽先民的希望和幻想,反映了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开始了征服自然的斗争。

如果说安徽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那么,在中华文化奠基期的春秋战国时期,安徽地域文化又为奠基期的中华文化铺下了坚实的基石。春秋时期,随着连绵不断的诸侯争霸战争,今安徽境内的许多诸侯小国(史称“东夷”和“淮夷”)纷纷被崛起于江汉平原的楚国和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兼并,所以安徽古代有“吴头楚尾”之称。这时期不仅有杰出的政治家管仲,以兴建安丰塘(古称芍陂)而流芳千古的孙叔敖,而且在文学上出现了南音与楚辞。涂山氏女作的《候人兮猗》被《吕氏春秋·音初篇》定为“南音”之始,也就是我国南方诗歌创作的老祖宗。冠居《诗经》诸篇之首的“二南”,即《周南》、《召南》,传说是周召二公征淮夷时,采撷当地民歌,删饰而成。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出现的《楚辞》,其中罗列纷陈的许多美丽动人神话故事,与同时代淮水流域产生的《庄子》,以及稍后出现的《淮南子》不无相似之处。班固《汉书·地理志》在条列各地风俗时,特把《离骚》诸赋置于合肥、寿春之下,说明其渊源所自与淮河流域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在跨今河南、安徽两省的古陈、宋地区,前后诞生了两位大思想家,一是老子,一是庄子。老庄思想对淮河流域的影响非常深刻,在此后一段很长时间里,这里成长起来的人物多属智术型的;产生的学术著作也多系倾向道家学说的杂家;世俗民情尚轻、巧,儒家思想的影响薄弱。应该说,老庄的道家文化和

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以及后来的佛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基本的框架结构。

3. 安徽地域文化的发展

如果把秦汉至宋明这一跨度很长的历史阶段,作为中国文化的成熟期,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无疑包含了安徽地域文化的发展,而安徽地域文化的发展又为促进中国文化的成熟贡献了巨大的力量。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上的统一相适应,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也趋于统一。到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文化政策上为后来以儒为宗的文化模式提供了蓝本。不过在西汉前期,由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游士四出的流风余韵犹存,故淮南王刘安广招宾客,由其主持集体撰写的新道家的经典著作《淮南子》,总体上宣扬“归之于道,旨近老子,淡泊无为,清虚守静”的思想。这种新道家思想后为武帝的“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打下去。自此,淮河流域的道家思想一蹶不振。秦汉之际,安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淮北较先进,江淮之间属过渡地带,江南比较落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发展也出现不平衡状态。淮北地区最发达,在《汉书·儒林传》中,有皖籍学者16人,淮北的沛郡12人;江淮地区次之,九江郡3人;皖南地区文化教育落后,没有出现文化类人材。从文学上看,源于南方的民间歌辞南音,到汉代发展为楚辞,流行于安徽、江苏等原楚国地区。《汉书·艺文志》诗赋类所收录两汉的歌赋大多或冠以淮南地名,或作者与淮南有关。可见,楚辞这种民歌形式盛行于安徽江淮地区,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篇五言长诗《孔雀东南飞》,诞生于东汉末年建安年间的江淮之间。

魏晋时期玄学大兴,而在玄学阵营中,由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和阮咸7位名士组成的“竹林七贤”十分有名,

其中嵇康与刘伶都是安徽淮北濉沛地区人。作为建安文学领袖人物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开创了“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魏晋时期安徽淮北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名流之士,在他们的推动下,使江淮大地出现活泼洒脱的文化景观。此外,在音乐、美术、书法等领域也大放异彩,如桓伊精音律、擅吹笛;戴逵琴技冠当世;谢赫善画山水、人物;薄绍之善书法等。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的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江淮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茶叶已成为安徽农业的重要部门。史书记载,当时江淮地区十分之二三农户以茶为业,祁门县竟有十分之七八农户以茶为业,此外,丝绸、瓷器、冶铜等也发展较快,尤其是“宣纸”、“宣笔”、“徽墨”、“歙砚”堪称“文房四宝”,驰名中外。在文学创作上,唐代诗歌是中国诗歌的发展高峰。安徽山川秀丽,人杰地灵,经济繁荣,是盛唐“诗仙”李白留踪、绝唱、归仙处,又是中唐诗人李绅、张籍,晚唐诗人杜荀鹤的家乡,他们的诗歌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说在隋唐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心逐渐南移,那么自五代开始至两宋,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五代时安徽不惟经济长足发展,而且人物荟萃,仅以见诸史传者计,约数百人。两宋时期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与经济繁荣相映衬的局面,书院的兴起,园林建筑热的出现,以灵璧张氏园、无为吴氏园、铜陵陈氏园为代表的园林艺术;方志著作的涌现,刻书业的兴起,都显示了安徽此间文化的繁荣。尤其在文学上,出现了以姚铉、梅尧臣、张孝祥等为代表的诗人、词人,为宋代诗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清正廉明的政治家包拯,更成了古今的清官楷模,众多戏曲、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为他塑造了极丰满的清官形象。

明清时期安徽的经济文化又有了较大发展。随着北方经济

的南移,兴起于宋元时期的徽商,至明清时期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集团之一。徽商的活动,在生产交换中架起了桥梁,活跃了商品经济,促进了江南市镇的兴起和繁荣。同时,又由于徽商本身文化素质较高,且重视文化教育,他们常不惜重金聘名师育子,热心于办社学、助书院,投资印刷业,这样就为明清文化的繁荣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由徽商的崛起而连带起徽派建筑艺术以及徽州医学的发展,当时的徽州名医辈出,形成为人瞩目的“新安医学”。文学上在清代的“桐城派”出现之前,桐城已有不少文坛英才,尤其是钱澄之这样的文学大师,其文章堪称桐城派的楷模。到了清代,安徽的文化除了延续以徽州文化为代表的发达局面外,又兴起了以“桐城文化”为中心的江淮文化带。明清之际的哲学与经学的兴起,继桐城方以智之后,安徽又出现了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大思想家,他博大精深,精于音韵、训诂、考据。在文学艺术上,小说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代表,开创了我国讽刺小说的先河;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主要人物有“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影响了一代文坛。戏剧方面以安庆为中心的徽剧,在清初逐渐形成,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轰动京师。在绘画方面,以歙县人渐江为代表,开创了“新安画派”,芜湖萧云从的山水,汤鹏的铁画,均为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如果说在乾嘉时代,安徽境内形成了专宗汉学的徽派和汉宋并用的桐城派两大文化派,构成了徽州文化和桐城文化两大地区文化,那么在此之前兴盛起来而在明清之际逐渐落后于江南的两淮文化,可以说,这三大文化区,构成了安徽文化的主体。到了近代,安徽文化同中国文化一样发生较快的演变转换,而在中国文化发生转换的过程中,安徽近现代文化又对中国文化的转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地域文化与现代皖籍作家的艺术创作

一定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教育状况、风俗民情,对该地区文学家的思想艺术、文学创作均会产生一定的渗透与影响。文化有地域性,文学有地域性,这一情况早已为古人发现。《礼记·王制》中记载了“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做法,就是要通过诗歌体察各地民情,诗歌与民风的联系,显示了诗歌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诗经·国风》按照 15 个地区汇集诗歌,生动地表现出各个文化区域的风土人情,是将文化按地域类分的先声。《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为“环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①。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唱。此其南北词的得失之大较也。”^②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形成文学风格的影响。法国 19 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则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中国近代的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从南北语言的不同,社会环境、风俗习尚的不同,论述春秋战国文学的南北之异,并进一步追踪流变,探讨南北文学各自的传承关系。他说:

① 参阅《宗经》、《辨骚》诸篇。

② 《隋书》卷 76。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因而“习为背实击虚之法”，形成了“庄、列、屈、宋之荒唐诡怪”之作品。汉赋的一些作家，李白、温庭筠、李商隐的作品，都有南方文学的特征。他们都把文学作品的风格与地域条件联系起来考察，透视了文学具有地域性特征。但他们都把注意力放在地域的自然环境上，而对人文环境诸复杂因素注意不够。在我们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因此，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的。安徽地域文化影响了安徽现代作家，使他们的创作也带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1、徽州文化与皖南作家群

若以明清时代徽州府的辖区，划分徽州文化区的行政范围，它应该包括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和黟县6个县。可是，文化有一种辐射作用，徽州文化对这6个县之外的周边地带，也有其辐射、渗透作用。徽州地处黄山山脉的东南，近人吴日法在《徽商便览·缘起》中说：“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若以地理环境与黄山山脉关系论，皖南山区的太平、泾县也该属徽州文化区域。徽州及皖南山区自古住有“山越人”，而芜湖早期的居民，既有山越人，又有扬越人，所以从“山越人”族系看，芜湖文化也在徽州文化辐射范围之内。从历史上看，安徽自古有“吴头楚尾”之谓，而江南地区多留吴越之风。吴越在春秋之际，连年征战，尚武习俗蔚然成风。《汉书·地理志》载：“吴越之君勇，故其民好用剑。”但晋永嘉之后，吴越民风却发生了转变。“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

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① 社会风气从“尚勇”逐渐转向“崇文”，文雅之风波及皖南，波及徽州。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后来徽商的兴起，为徽州文化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他们不仅建造了作为徽州文化的物化表征的牌坊、宗祠和各类建筑，在传统文化上也深深地影响了徽州人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以及社会风习。到明清时代，徽州风雅之习更传于闺房之中，使徽州文风盛名天下。而维系徽州文雅之风使其不断得以承传的是儒家教化。清雍正年间《茗州吴氏家典》卷首曰：“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徽州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受其观念影响很深，“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掺入者。”^② 传统的儒家教化，森严的宗法制度，在徽州得以保持和传承，使它成了礼仪之邦。在这里，有的是知书达理，循规蹈矩，很少风流怪诞之士，体现了传统文化稳重、严肃的一面。因此，生长在这块文化土壤里的现代作家，像胡适、苏雪林、汪静之、章以萍、吴组缃、阿英等，他们的心理气质及作品的文化风韵，均具有庄重、厚实的儒雅之风。胡适(1891—1962)最能体现徽州文雅之风。因为他早年留洋获得洋博士学位，又因为他师从杜威接受其实验主义，故有人说他一味“崇洋”，搞什么民族虚无主义。又因为他后来提倡“整理国故”，故又有人说他是封建复古。其实他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又不是封建复古主义，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个体。他是以徽州汉学打底，西洋文化尤其是西方科学的方法论镶边的中国旧文化的改革者，新文化的创造者。胡适出生在上海，5岁时随母回绩溪老家，始进学堂。四叔胡介如(塾师)以其父所撰《学

① [明]刘槩《成化记》。

② [清]《徽州府志》卷一《风俗》。

为人诗》教他，后来胡适回忆说，其中“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自知，反躬践实。黽勉于学，守道勿失”寥寥数语，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①。在母亲和塾师的严格管教下，他熟读了朱子的《子学》、老子的《原学》、《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书。9岁时开始看小说，他把明清的小说，包括许多并非说教的通俗小说，都不假分辨地读完了。由传统儒家文化教养，尤其是父亲对他施行的程朱理学教育，及至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程朱理学派的唯理主义一些倾向^②。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思想、道德规范铸造了胡适，使他在思想性格、行为方式上保持了温文尔雅、端庄敦厚的姿态，虽然在“五四”时期，他以批评儒家思想而出名，好像是以“反传统”面貌出现，其实他思想深处仍被紧紧扣在“传统”之上，他的文学革命的一些主张包括里面的言语措辞，用“改良”“刍议”等等，都是比较温和的。而在行为方式上，比如在婚姻问题上，他遵循母亲的包办婚姻，按家乡的风俗习惯，14岁就定了亲，尽管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深深爱上了康乃尔大学某教授之女韦莲司，但并没有动摇他的“包办婚姻”，他和江冬秀做到了“白头偕老”。他在学术思想上，以汉学为宗，无不受徽州汉学大师戴震影响。汉学之兴，乃因宋明理学以理学解经，使经学真义隐没，故汉学之目的在使经学之本义重新复其旧观。但胡适比戴东原有了新的创造，他的目的不光在使经学之本义重复旧观，而更在于他受前辈学者康有为、章太炎和西方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等学术思想影响，从而形成了他的发展批判精神，也即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真诚的反省精神。他说：“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

①② 胡适：《四十自述》34页。